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

陈有华，张 壮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在构建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影响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粤、鄂两地的问卷调研数据，并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了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认知程度、身体健康及经济形势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身体健康及经济形势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研究进一步发现，积极的就业规划、工作搜寻次数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所在地风险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建议极力恢复经济，加强对劳动者的心理疏导与就业指导，消除地域就业歧视，多渠道扩宽招聘渠道，以促进疫情期间劳动者的正常就业。

关键词：新冠肺炎；就业预期；工作搜寻；中介效应；就业歧视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0)04－0105－15

一、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经济社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智联招聘基于 2020 年度 2 月 3 日至 7 日的求职大数据，发布了《春季求职竞争周报(2.3－2.7)》（下称“周报”）。周报显示，从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上看，52.63% 准备延迟复工，而 18.37% 的企业则处于观望状态，仅有 17.72% 的职场人所在企业准备复工。更为糟糕的是，同比 2019 年，春节复工一周的企业招聘职位数下降了 71.66%。从劳动力的市场供给上看，同比 2019 年，求职者的简历投递需求下降了 83.35%。数据表明，相比企业复工，解决劳动力的供给问题同样重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加大宏观政策的调节力度，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

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及学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相关学者对就业问题的研究也相对丰富，从搜寻成本及供需矛盾的角度进行分析[1－3]，从教育质量及政策供给的角度进行分析[4－5]，从社会资本及个人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6]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劳动者就业更是面临严重考验，一方面经济受到重创，企业出于风险的考虑，减少了对职位的供给，部分企业甚至还有裁减员工的可能，旅游服务、餐饮娱乐、销售贸易、交通运输、证券保险等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部门均受到严重冲击，职位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不少劳动力就业预期也出现了悲观情绪。市场受到一定的冲击，企业的人员需求下降，就业市场低迷；大多招聘在线上开展，部分劳动力无法向心仪公司投递简历；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企业依然无法恢复正常招聘。以上经济形势引发了劳动力就业的强烈不安全感，即较差的心理预期。

收稿日期：2020－04－07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0.04.010

基金项目：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人才支持项目(201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YJC790156)；广东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GD2018CYJ01；GD17XYJ2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A030310669)

作者简介：陈有华(1984—)，男，江西瑞昌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教育经济。E-mail：yhchen214@scau.edu.cn

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经历歧视现象[7-8]。经验越丰富的劳动力更可能具备乐观的工作预期与劳动参与意愿。疫情背景下,经验丰富的劳动力就业预期可能较稳定,但难以测度。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丰富的经历、经验及已有的社会网络让他们的工作搜寻能力与竞争能力都很强;二、即使他们中部分人的就业预期受疫情的影响,但是很难外显为行动,因为他们承担着或分担着家庭的经济压力。然而,对那些没有经验的高校毕业生而言,情况可能是完全不同。疫情让他们失去了大量身临其境寻找工作的机会,加上工作经验的缺乏,就业不安全感更为明显。而值得注意的是,那部分具有经验但不具备丰富社会资源的劳动力也会是相同的情况,只是这种影响会被隐藏。除了考虑测量的问题,研究也考虑到巨量的高校毕业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9]。

危机下的就业环境令人担忧。Alfani & Percoco 以1629—1630年意大利大瘟疫为例,从生产率冲击的角度证明瘟疫对经济会产生长久且负面的影响[10]。蔡昉认为"非典"疫情激化了我国的就业矛盾,失业问题更为突出[11]。陆义敏通过金融危机前后两次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认为大学生就业预期的调整滞后于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12]。王震认为本次疫情对就业的冲击远比2003年的"非典"疫情严重[13]。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一方面需要恢复经济,为劳动力就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另一方面需要稳定其就业预期。而稳定就业预期,势必要厘清疫情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机理,以便政府实施更为有效的就业促进政策。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力就业预期影响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粤、鄂两地高校本科毕业生为对象,验证了疫情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政府及企业决策提供相关的解决思路。

二、文献综述

失业一直是各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除了从宏观的视角进行分析,微观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其基本的研究综述如下。

工作搜寻过程中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是就业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消费者购买行为,Stigler 最早提出固定样本搜寻理论,即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最终决策的形成要充分考虑搜寻成本[14]。考虑到固定样本搜寻模型的假设过强,McCall 用更接近实际的时序搜寻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搜寻现象,他认为当且仅当边际搜寻成本与边际搜寻收益相等时,劳动者才会停止搜寻[1]。Diamond、Mortensen 与 Pissarides 引入企业的搜寻行为,将其行为内生化,为分析劳动市场的经济效率提供了基础。Diamond 认为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搜寻成本的存在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率并存的现象,工资报价分布为外生的工作搜寻基本模型存在严重缺陷[15-16]。Mortensen 对个体劳动者的决策进行研究,强调了异质性、可替代性与搜寻时间的长短对其失业的影响[17]。Mortensen 与 Pissarides 将工人和企业的双边搜寻引入模型,认为市场摩擦是造成失业的重要原因[18]。Po 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生适当地降低保留工资将有助于其就业机会的显著提升[19]。Shapiro 与 Stiglitz 认为高工资会助推过度搜寻行为,以致就业不足[20]。Blaug 认为大学生不愿意降低其保留工资是造成其失业的重要原因[21]。Smith 通过斯塔克伯格模型的均衡分析,认为工资水平与工作搜寻程度具有正向关系[22]。Acemoglu 通过企业搜寻匹配机制的建立,认为劳动者所提供的技能不符合企业生产率的要求是导致其失业的重要原因[23]。赖德胜分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大学生与企业的双边搜寻成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的重要原因[24]。

劳动力市场供需分析是一个最基本的研究视角。Carnoy 认为企业是主要的经济主体,其维持一定的大学生失业率有利于压低市场工资及提高其生产积极性[25]。Pryor 认为教育质量与专业设置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4]。Gray 认为大学学历只是起到了部分筛选器的作用,部分大学生毕业生实质上只能从事与高中生文化程度相当的工作[5]。Higgins 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

是供求双方的责任,就业意愿、就业能力、供求匹配及效率不足是造成失业的重要原因[2]。随着高等教育教育的发展,毕业生数量的增长也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剩,这是高校毕业生失业的重要现实原因[2-3,19,26-27]。

就业预期是国际上研究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Betts 通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校生的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所读年限、肤色、性别、家庭背景、学业表现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影响[28]。Dominitz 和 Manski 基于 Betts 的视角再次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大学生的就业预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大学生倾向于高估自己的预期工资同时夸大社会工资的不平等[29]。蒋承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预期匹配程度并不高,学生干部的经历与行业匹配正相关[30];蒯鹏州发现大学生就业形势预期的引入,性别、民族家庭背景等因素对就业服务需求的影响系数发生了变化[31]。雷湘竹认为性别对就业预期存在影响,低年级的女大学生比高年级的更倾向于就业内部归因,就业归因与就业预期存在正相关[32]。刘佳音则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就业预期偏高,而预期偏高又以薪酬预期高为主[33]。

曾湘泉认为从简单的供需矛盾、搜寻理论及预期的视角分析就业问题存在明显的缺陷,要注重从制度和市场两个角度分析中国的失业问题[2]。学者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的社会地位(父母的职业地位、学历、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与子女单位选择、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34-35]。朱晓妹从个体因素及环境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包括学历、专业、能力、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自我意识等[36]。郑洁发现家庭社会资本越高的大学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继续学习深造,这部分毕业生往往推迟就业而不是直接就业[37]。范皑皑研究发现,收入预期对大学生就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不同学历层次之间存在差异[38]。尉建文认为父亲教育程度、家庭网络规模会影响学生的继续深造意愿,父亲职业地位大小会影响学生的工作意愿,家庭收入会影响学生期望月薪[39]。陆义敏认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用工预期已经出现深度调整,而大学生就业预期的调整往往具有滞后性,因此会导致匹配实现时间延长,加剧大学生就业难问题[12]。

以往对失业的微观研究集中在供需匹配、工作搜寻、就业预期及社会资本等问题的研究,较少研究将个人的主观心理引入工作搜寻模型当中,也较少有研究测度突发公共事件对就业预期的影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期间高校毕业生的心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为分析高校毕业生心理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提供了契机。基于心理的可描述性,本文选择疫情认知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此外,以往的研究很少实现对劳动者能力、个性以及过去经历的合理控制,较少关注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用工具变量进行解决。

三、理论基础

(一)理论与假说

正如综述所言,预期是影响劳动者就业的重要因素,且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其预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疫情是如何影响劳动者就业预期呢? 本文做出如下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影响就业预期。部分学者认为,环境对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40-41]。疫情认知是人们认知能力的具体表现,是其在突变环境下的心理反应。另外,毕业生的求职是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42],其往往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产生就业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43]。求职的过程也可能被毕业生视为威胁,从而导致其强烈的不安全感[42]。医护人员也认为,在疫情期间各类人群的认知会有所变化[44]。据此,提出第一个基本假设:

H_0^1: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具有正向的影响。

劳动者的认知往往引发其对经济形势、身体健康悲观抑或是乐观的情绪。杨辉认为环境认知

对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5]。Bockorny 与 Frese 认为乐观的心理对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6-47]。魏国江的实证研究表明希望、韧性、乐观等健康心理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8]。Grossman 认为健康可以作为一项人力资本要素,而个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及生活的环境都会影响个人的健康[49]。据此,提出第二个基本假设:

H_0^2: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身体健康具有正向的影响。

情绪与理性是人们进行经济决策的两大依据[50]。Buck 认为人的认知分为综合性认知与分析性认知,由此衍生出理性与情绪[51]。脑科学与神经科学家一致认为情绪的反应速度要高于理性[51-53]。部分行为经济学家也认为情绪与认知对个体的判断与决策具有影响,如 Goleman 认为情绪是认知的一部分,它能产生与预测一致的决策行为[52]。据此,提出本文第三个基本假设:

H_0^3: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经济形势预判具有正向的影响。

周孝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综合性的健康投资对就业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单一性的健康投资影响系数要小很多[54]。张车伟用农村贫困地区的数据证实了健康对劳动效率的影响[55]。魏众认为健康状况对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具有显著的影响[56]。Luft 用美国成年劳动力的数据证实了健康对劳动参与的显著正向影响[57]。邓晓红认为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与心理健康呈显著负相关[58]。据此,提出本文第四个基本假设:

H_0^4:身体健康状况对就业预期具有正向的影响。

经济形势对就业预期的影响研究更为普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它们解释了预期、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以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赵俊英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持续增长没有带来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升[59]。张建武也同样证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短期不一致性[60]。周德禄却认为毕业生的就业比重与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及产业升级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性[61]。据此,提出本文第五个基本假设:

H_0^5:经济形势对就业预期具有正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可能引发劳动者对经济形势的担忧或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忧虑,进而导致其悲观的就业预期,即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的影响可能存在两个中介——健康状况与经济形势,据此提出本文的第六个和第七个研究假设:

H_0^6:健康状况在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H_0^7:经济形势在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二)理论模型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述假说的科学性,本研究建立附加主观心理的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模型。基本假定如下:(1)劳动者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具备风险中性的特性,其工作搜寻的行为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核算而非主观随意决定。(2)工资分布曲线与市场信息为劳动者所知晓,每次工作搜寻相互独立,不存在序列相关。(3)经济发展程度与职位空缺率正向相关,个人心理会对就业产生影响。

根据 Mccall 所提出的工作搜寻模型,假定工资服从正态分布[1],即:

$$W \sim N(\mu, \sigma^2) \tag{1}$$

毕业生的保留工资为 W_c,则每次寻找工作的期望收益为:

$$E(W - W_c \backslash W) \tag{2}$$

由(1)与(2)的结论可知:

$$E(W - E_c \backslash W) = \int_{-\infty}^{+\infty} \frac{1}{\sqrt{2\pi\sigma}}(W - W_c)\,\mathrm{Exp}\left(\frac{-(W-\mu)^2}{2\sigma^2}\right)dW =$$

$$\int_{W_c}^{+\infty} \frac{1}{\sqrt{2\pi\sigma}}(W - W_c)\mathrm{Exp}(-\frac{(W-\mu)^2}{2\sigma^2})d = \sigma^2 f(W_c) + (W_c - \mu)(1 - F(W)) \tag{3}$$

考虑个人主观因素,毕业生的单位搜寻收益 $E(W - W_c \backslash W)$ 还会受到意愿流动率 v 的影响。v 受到市场预期 s,健康状况 h,以及毕业态度 p 的影响,即:

$$v = \min(\theta_0 s, \theta_1 h, g(p)) \tag{4}$$

当且仅当 $\theta_0 s = \theta_1 h = g(p)$ 时,劳动力才会流动,即 $v = \theta_0 s = \theta_1 h = g(p)$。上述式子中,$\theta_i > 0$,即市场预期、健康状况对意愿流动率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无法确定毕业态度对意愿流动率的影响方向,因为毕业态度好的毕业生可能继续深造,即 $v \to 0$,也有可能积极地面向劳动力市场,即 $v > 0$。

根据赖德胜[3]所构造的搜寻成本模型:

$$S = an + bn^2 \tag{5}$$

上述式子中,$a, b > 0$,a 为市场流动性障碍的度量指标,n 为搜寻次数。市场的复工率受经济形势 e 与其他因素 o,其中 $k > 0$。

$$u = ke + o \tag{6}$$

当市场边际搜寻成本等于边际搜寻收益时,工作搜寻停止。此时劳动市场实现了均衡,即:

$$(ke + o)(a + 2bn) = v[\sigma^2 f(W_c) + (\mu - W_c)(1 - F(W_c)] \tag{7}$$

解得:

$$s = \frac{\theta_i h}{\theta_0} = \frac{(ke + o)(a + 2bn)}{\sigma^2 f(W_c) + (\mu - W_c)(1 - F(W_c)} \tag{8}$$

$$\frac{ds}{de} > 0, \frac{ds}{dh} > 0, \frac{ds}{dn} > 0, \frac{ds}{dW_c} < 0 \tag{9}$$

疫情认知程度 ε 对个人身体健康与经济形势都具有正面影响,即对疫情的看法越乐观,身体健康与经济形势就越可能向好的事态发展,即

$$\frac{dh}{d\varepsilon} > 0, \frac{de}{d\varepsilon} > 0, \frac{dp}{d\varepsilon} > 0 \tag{10}$$

由(9)与(10)可推导疫情认知程度 ε 对就业预期 s 的影响,即:

$$\frac{ds}{d\varepsilon} = \frac{\frac{d\varepsilon}{dh}}{>0} * \frac{\frac{dh}{d\varepsilon}}{>0} = \frac{\frac{d\varepsilon}{de}}{>0} * \frac{\frac{de}{d\varepsilon}}{>0} > 0 \tag{11}$$

式(11)验证了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的影响,即验证了假说 1;(10)式说明了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身体健康与经济形势预判的正向影响,即验证了假说 2 与假说 3;式(9)验证了经济形势、身体状况对就业预期的正向影响,即验证了假说 4 与假说 5;进一步地,式(11)也说明了健康状况与经济形势在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即验证了假说 6 与假说 7。

本文所提出的机制可以由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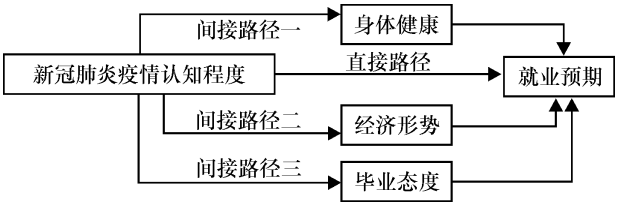


图 1　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机制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校毕业生是一类较为特殊的就业群体,新冠肺炎疫情对其就业预期的影响即具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因此,本文实证研究使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的影响调查"的问卷数据。问卷的主要填写对象为粤、鄂两地的本科毕业生,但受疫情本身影响,湖北地区高校问卷回收相对较少。问卷填写者的现居地区为全国各地,但主要为粤、鄂两地,其中广东省占到样本近90%,而湖北省略低于10%。基于疫情的全球性,样本分布虽存在一定的不均匀性,但其对基本结论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实际收到问卷830份,其中女生占到70.27%,共涉及经管、文史、政法、理工、医学及农学七个专业类别。为了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本文剔除了年龄过小(<20)、年龄过大(<25)及非本科生毕业生的样本数据,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29份。

本次调研数据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含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量、未来规划、户籍、所在地、所读专业类别、家庭年收入金额及家庭总储蓄金额共9个变量。心理测度的变量涵盖就业预期、经济形势、毕业态度、身体健康以及疫情认知程度5个一级指标共32个二级指标问题,采取Likert五级量表形式供受访者选择认同程度。经过第一轮因子分析共确定19个二级指标。为了克服因整体性因子分析而削弱变量间的相关性的问题,本文进行了逐项的主成分分析,并确定了最终的权重系数,并将其进行标准化,如表1。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的KMO度量为0.791,即本问卷具

表1 因子得分与问卷质量

变量	编号	指标	得分系数	标准化系数	α
就业预期	A1	我觉得我丧失了好多就业机会	0.816	0.271	0.826
	A2	我觉得我疫情期间找到工作比工资重要得多	0.662	0.220	0.837
	A3	我觉得我毕业后的工资受到了严重影响	0.787	0.262	0.83
	A4	我觉得我不再能找到符合我的工作	0.743	0.247	0.828
经济形势	B1	我觉得企业将进一步缩减生产规模	0.83	0.264	0.832
	B2	我觉得我手上的钱越来越不值钱	0.78	0.248	0.834
	B3	我觉得疫情将重创国民经济	0.772	0.245	0.834
	B4	我觉得今年的就业总体形势肯定不好	0.767	0.244	0.834
毕业态度	C1	我觉得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会放我过关	0.936	0.356	0.842
	C2	我觉得论文指导老师会放我一马	0.925	0.352	0.84
	C3	我觉得学校一定会让我毕业的	0.77	0.293	0.847
身体健康	D1	我觉得我不能集中精力在一件事上	0.849	0.346	0.834
	D2	我觉得我的睡眠质量超级差	0.795	0.324	0.835
	D3	每天都离不开手机导致疲劳	0.81	0.330	0.836
疫情认知	E1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0.932	0.376	0.837
	E2	我觉得自己的健康受到了威胁	0.907	0.365	0.839
	E3	我觉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与否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0.643	0.259	0.839
信度效度检验	KMO	KMO和Bartlett检验 Bartlett检验		可靠性统计量 项数	α
	0.791	近似卡方=5537.658/df=136/sig=0.000		17	0.843

注: *α=克隆巴赫尔系数。

有较好的效度。通过可靠性分析,确定本问卷的整体信度为 0.843,单项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8,这说明本问卷具有极高的信度。

(二)变量选择

核心变量。本文选择的因变量为就业预期,是通过因子分析后的得分系数相加合并而成,经济形势、身体健康与毕业态度等解释变量都是通过同样的方法得到。月期望基本工资、工作搜寻次数及平均搜寻成本是工作搜寻模型中的关键经济变量,因而也都是本研究的关键变量。考虑到受访者填写的便捷性与准确性,月期望基本工资与平均搜寻成本都采取区间选择题的形式,用 1 - 5 代表程度等级。月期望基本工资与平均搜寻成本越高,相应得分也就越高。

控制变量。本文选择的其他变量分为人口特征变量、地理特征变量与家庭经济变量,具体为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量、未来规划、户籍、所在地、所读专业类别、家庭年收入金额及家庭总储蓄金额。考虑到部分受访者可能会隐藏个人具体信息,本文对这些变量都进行区间式选择处理,以免出现问卷的过度偏差。

工具变量。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变量中,很难控制本科毕业生的个人性格、能力以及过去经验等变量,遗漏变量是本文内生性的第一个原因。就业预期好的本科毕业生往往具备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即就业预期可能会反向疫情认知,反向因果成为本文内生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本研究关注到高校毕业生疫情的认知往往受到疫情相关信息的影响,而高校毕业生所关注的疫情信息一般与工作没有必然的关系,即如果疫情相关信息对就业预期产生影响,只能经过中间渠道——疫情认知,可知疫情相关信息是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影响的优良工具变量。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变量释义	均值	方差
性别	792	1 = 男 0 = 女	0.297	0.457
未来规划	792	1 = 就业 0 = 不就业	0.725	0.447
家庭规模	792	1 = [0,3) 2 = [3,5)3 = [5,8) 4 = 8 及以上	2.134	0.642
户籍	792	1 = 城市 0 = 农村	0.501	0.5
所在地风险	792	1 = 低风险;2 = 中风险;3 = 高风险;	2.927	0.301
主修专业	792	1 = 经管 2 = 文史 3 = 政法 4 = 理工 5 = 医学 6 = 农学 7 = 其他	1.128	0.746
家庭年收入	792	1 = (0,2w) 2 = [2w,5w) 3 = [5w,10w) 4 = [10w,15w) 5 = [15w,20w) 6 = [20w,30w) 7 = 30w 以上	3.864	1.838
家庭总储蓄	792	1 = (0,2w) 2 = [2w,5w) 3 = [5w,10w) 4 = [10w,15w) 5 = [15w,20w) 6 = [20w,30w) 7 = 30w 以上	4.101	2.448
期望工资	792	1 = (0,3k) 2 = [3k,5k) 3 = [5k,1w) 6 = [1w,1.5w) 7 = [1.5w,2w) 8 = 2w 及以上	3.047	0.635
搜寻次数	792	0 = 0 次 1 = 1 次 2 = 2 次 3 = 3 次 4 = 4 次 5 = 5 次及以上	3.375	2.062
平均搜寻成本	792	1 = (0,100)2 = (100,500)3 = (500,1000)4 = (1000,1500)5 = 1500 元及以上	1.458	0.807
锻炼增加幅度	792	锻炼时间增加的百分比	18.86	22.4
学习增加幅度	792	学习时间增加的百分比	29.96	26.1
休息增加幅度	792	休息时间增加的百分比	46	28.76
娱乐增加幅度	792	娱乐时间增加的百分比	47.32	28.82
工作预期	767	通过因子分析合成	2.851	0.872
经济形势	792	通过因子分析合成	3.523	0.819
毕业态度	792	通过因子分析合成	2.977	1.028
身体健康	792	通过因子分析合成	2.707	0.948
疫情认知	792	通过因子分析合成	2.258	0.954

(三)计量模型

为测度新冠肺炎疫情认知(Think)、身体健康(Health)、经济形势(Economic)及毕业态度(Attitude)对就业预期 Expect 的影响,使用 OLS 方法对下列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其中 $\beta=(\beta_0,\beta_1,\beta_2,\beta_3)$,$X=(Think,Health,Economic_i,Attitude_i)^T$,$C_i$ 为其他控制变量,ε_i 为残差项,即:

$$Expect_i=\beta X+\sum\theta_i C_i+\varepsilon_i \tag{11}$$

为了测度身体健康(Health)、经济形势(Economic)的中介效应,需要引入辅助回归方程,其中 $\beta=(\beta_0,\beta_1,\beta_2,\beta_3)$,$Y=\{Health;Economic_i\}$,$p_i$ 为其他控制变量,ς_i 为残差项,即:

$$Y=\gamma_0+\gamma_1 Think_i+\sum\sigma_i p_i+\varsigma_i \tag{12}$$

本文可以在(10)的基础上引入疫情信息关注程度作为工具,解决部分内生性问题,即:

$$Expect_i=\beta X+\varphi_i IV+\sum\theta_i C_i+\varepsilon_i \tag{13}$$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疫情认知程度对工作预期的影响

通过 OLS 回归,可知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经济形势、身体健康、毕业态度对就业预期均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即验证了假说 H^1H_0、H^2H_0 及 H^3H_0。通过回归系数可进一步得知经济形势对就业预期具有更大程度的影响,其后逐次是身体健康、毕业态度、疫情认知。根据第一个回归的结果可知,毕业态度对就业预期的影响具有较为显著的"倒 U"特征。即当毕业态度越来越好时,就业预期是上升的;但是当毕业态度好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毕业生往往呈现负向的就业预期,即会离开劳动力市场选择深造。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进一步发现:(1)相比那些准备深造的毕业生,具备积极的就业规划的毕业生具备更好的就业预期。(2)所在地的风险等级直接影响到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预期,所在地的疫情风险越高,毕业生具备的就业预期就越差。(3)工作搜寻次数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学习增加幅度会对大学生的就业预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存在两种原因:a 首先,学习投入时间的增加导致高校毕业生对疫情及之后的工作环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对就业具备更好的预期;其次,学习投入时间的增加导致部分高校毕业生转移了对工作形势的注意力,因此没有对就业持有太过悲观的预期。可能由于问卷中的家庭年收入、家庭总储蓄、期望工资等问题是受访者所回避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中并未发现其对就业预期的显著影响。

(二)经济形势、身体健康及毕业态度的中介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已经知道了疫情认知、经济形势、身体健康对就业预期均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也需要厘清变量间的关系,进一步验证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作用机制。

使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逐次回归检验方法[62]。首先检验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经济形势、身体健康及毕业态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经济形势、身体健康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即验证了 H_0^4 与 H_0^5。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具备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回归放弃对经济形势的控制之后,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只是系数明显放大,综合两次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形势在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即验证了 H_0^6;同样,当回归放弃对身体健康的控制之后,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明显放大,综合两次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形势在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即验证了 H_0^7。当回归放弃对身体健康的控制后,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回归放弃对毕业态度的控制后,系数只变动了百分之一不到。同时也不满足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逐次回归检验的要求[59],即不能说明毕业态度在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

表 3　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的影响

变量	就业预期				经济形势	身体健康	毕业态度
疫情认知	0.0774**	0.126***	0.13***	0.0818**	0.130***	0.211***	1.39e-05
	0.0316	0.0334	0.0327	0.0321	0.031	0.0342	0.046
经济形势	0.318***		0.38***	0.323***		0.271***	0.138***
	0.0343		0.0349	0.0343		0.0432	0.0532
身体健康	0.267***	0.351***		0.268***	0.223***		0.0427
	0.0365	0.0390		0.0369	0.036		0.0501
毕业态度	0.0779**	0.109***	0.082**		-0.183	-0.0194	
	0.0341	0.0344	0.0368		0.14	0.162	
毕业态度平方	-0.0420*	-0.0261	-0.0406		0.0423*	0.00784	
	0.0252	0.0260	0.0271		0.0219	0.0251	
学习增加幅度	0.0038***	0.0044***	0.00260*	0.00424***	0.00154	-0.00410***	0.00367**
	0.00132	0.00147	0.00145	0.00132	0.00138	0.00148	0.00161
性别	0.0721	0.0494	0.0941	0.0730	-0.0802	0.0702	0.156*
	0.0637	0.0659	0.0677	0.0639	0.0616	0.0682	0.0862
未来规划	0.243***	0.241***	0.23***	0.257***	-0.00369	-0.0533	0.0520
	0.0742	0.0799	0.0775	0.0756	0.0749	0.0781	0.0993
家庭规模	-0.0657	-0.0442	-0.0778	-0.0636	0.0330	-0.0548	0.0565
	0.0475	0.0515	0.0488	0.0477	0.0452	0.0511	0.063
户籍	0.0441	0.0972	0.0263	0.0426	0.114*	-0.0528	0.0353
	0.0636	0.0690	0.0652	0.0644	0.0626	0.0671	0.0813
所在地风险	-0.366***	-0.337***	-0.331**	-0.364***	0.0423	0.0759	0.121
	0.114	0.117	0.130	0.114	0.12	0.14	0.143
主修专业	-0.00893	-0.0270	0.0232	-0.00667	-0.0522	0.0806*	-0.0565
	0.0588	0.0488	0.0627	0.0637	0.0421	0.0429	0.0642
家庭年收入	-0.0219	-0.0162	-0.0219	-0.0192	0.0153	-0.00384	0.00902
	0.0224	0.0237	0.0236	0.0224	0.0219	0.0227	0.0275
家庭总储蓄	-0.0137	-0.0151	-0.0284*	-0.0151	-0.00241	-0.0543***	-0.0106
	0.0165	0.0177	0.0169	0.0165	0.016	0.0174	0.0209
期望工资	-0.0151	-0.00780	-0.0167	-0.0128	0.0155	-0.000633	0.0813
	0.0471	0.0486	0.0516	0.0471	0.0526	0.0591	0.0646
搜寻次数	0.118***	0.136***	0.11***	0.115***	0.045***	-0.0145	-0.0104
	0.0166	0.0181	0.0174	0.0168	-0.0156	0.0168	0.0201
平均搜寻成本	0.0498	0.0698**	0.0549	0.0446	0.0269	0.0155	-0.0991**
	0.0312	0.0348	0.0347	0.0316	0.0363	0.0429	0.0459
娱乐增加幅度	-0.00149	-0.000959	4.15e-05	-0.00159	0.00106	0.00596***	-0.00104
	0.00144	0.00144	0.00158	0.00144	0.00136	0.00166	0.00192
休息增加幅度	0.000187	0.000500	0.00087	0.000358	0.00118	0.00196	0.00241
	0.00145	0.00151	0.00158	0.00146	0.00144	0.00164	0.00192
锻炼增加幅度	-0.00104	-0.00140	-0.00185	-0.00131	-0.00096	-0.00261	-0.00250
	0.00156	0.00162	0.00167	0.00156	0.00145	0.00161	0.00188
常数项	-0.324	-0.567**	-0.305	-0.388*	2.286***	1.386***	2.025***
	0.220	0.232	0.237	0.219	0.312	0.373	0.35
样本量	767	767	767	767	792	792	792
R-squared	0.406	0.329	0.355	0.401	0.173	0.250	0.044

注:*** $p<0.01$,** $p<0.05$,* $p<0.1$,系数下方为稳健标误。为节省篇幅,除表 3 外,其他回归结果仅报告了重要变量的估计结果。

(三)内生性问题讨论

上述截面数据回归的一个缺陷是,由于问卷无法准确对高校毕业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或者说遗漏了重要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比如他们的能力、性格及过去的经历等相关变量,这极有可能造成本文研究上的内生性问题。另外,工作预期好的高校毕业生往往心理的健康程度及抗压能力可能也要高于一般的高校毕业生,因此就业预期也可能会对疫情认知程度产生影响,即反向因果成为本文内生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前面工具变量选择的分析,可知疫情信息的关注程度在理论上是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问卷中疫情信息的关注程度包括两个问题的具体得分,即"我觉得每天公布的疫情相关信息真实性不足"与"我觉得每天公布的疫情相关信息时效性不够"两个问题。

表4 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的影响(内生性处理)

变量	TSLS(1)	TSLS(2)	TSLS(3)	TSLS(4)
疫情认知	0.340***	0.434***	0.464***	0.356***
	0.105	0.108	0.103	0.106
学习增加幅度	0.00352***	0.00399***	0.00268*	0.00378***
	0.0013	0.00148	0.00144	0.00131
经济形势	0.341***		0.372***	0.344***
	0.0436		0.0488	0.0438
身体健康	0.193***	0.257***		0.191***
	0.0428	0.0481		0.0433
毕业态度	0.181	0.117	0.154	
	0.141	0.147	0.153	
毕业态度平方	-0.0210	-0.00596	-0.0162	
	0.0221	0.0235	0.0239	
未来规划	0.192***	0.196***	0.196***	0.203***
	0.0675	0.0758	0.0737	0.0687
所在地风险	-0.307***	-0.273**		
	-0.270**	-0.301***		
	0.114	0.116	0.129	0.116
搜寻次数	0.0596***	0.0745***	0.0551***	0.0579***
	0.0149	0.0167	0.0161	0.015
常数项	0.131	0.799**	0.316	0.401*
	0.297	0.333	0.326	0.244
观测值	767	767	767	767
R平方	0.342	0.201	0.232	0.328
Robust score chi2	8.95299***	11.3448***	15.9072***	9.84747***
识别不足检验	45.155***	41.058***	58.481***	46.617***
Hansen J	0.668	1.892	0.586	0.743
Cragg-Donald Wald F	38.044	41.058	49.014	38.782
Stock-Yogo critical values		19.93(10%)		

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上述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四个模型 Robust score 卡方的显著性表明,工具变量的使用使内生性问题得到了检验,说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比 OLS 估计方法更具准确性。同时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值明显大于 Stock-Yogo 10% 的临界值,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体现过度识别检验的 Hansen J 统计量的值并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也不存在识别不足的问题。通过内生性问题的处理,疫情认知对工作预期的影响系数至少提高了三倍以上,说明 OLS 方法过小地估计了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同时,经济形势、身体健康、学习增加幅度对就业预期的显著正向影响依旧存在;是否具备就业规划及搜寻次数对就业预期依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所在地风险对就业预期仍然具有负向显著影响;但是毕业态度对就业预期影响的"倒 U"型特征已不复存在。可能原因是 OLS 估计方法忽视了能力与个性这个至关

重要的控制变量。性格开朗的学生往往具有更强的就业预期,能力越强的学生往往具备更强的就业预期与更好的毕业态度。考虑这两大因素后,毕业态度对就业预期的“倒 U”型影响特征假说比较难实现。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对中介机制分析进行准确性度量,本研究使用 Sobel 与 Boostrap 对中介机制再次进行验证,同时将样本数量进一步截断减少,使用 Tobit 模型对本文的机制再次进行研究。

1. 稳健性检验一:Sobel 与 Boo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Sobel 检验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可知模型 1 和模型 2 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都是显著的,即进一步验证了经济形势与身体健康在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而并未发现毕业态度的中介效应。使用 Boo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行 500 次重复抽样,同样得到了与 Sobel 中介效应检验相同的结论,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系数非常地接近,得到相同的结论。Sobel 与 Boostrap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经济形势与身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显著且稳健。

表 5　Sobel 与 Boo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Sobel 1	Boostrap1	Sobel 2	Boostrap2	Sobel 3	Boostrap3
直接效应	0.05030***	0.05030***	0.0522***	0.0773**	0.0002	0.0002
	0.01246	0.01287	0.01036	0.0294	0.0022	0.0028
间接效应	0.07726***	0.07726***	0.0773***	0.0198***	0.0773***	0.077255***
	0.02730	0.02917	0.02777	0.1347	0.0273	0.0296361
总效应	0.12755***		0.1295***		0.0775***	
	0.02939		0.0279		0.0274	
中介变量	经济形势		身体健康		毕业态度	
相关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2. 稳健性检验二:Tobit 模型的再检验

使用更小的样本对本文所提出的中介机制进行验证。首先使用 IV-Tobit 模型估计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结果表明,疫情认知、经济形势、毕业态度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H_0^1 \sim H_0^3$ 的假说再次得到了验证。同时,实证结果也表明毕业态度、未来规划及学习增加幅度对就业预期依然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所在地风险对就业预期的负向显著性影响再次得到了检验。使用 Wald 检验发现了模型的内生性,同时检验结果也表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隐患,即进一步说明了本研究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按照逐次回归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使用 Tobit 方法再次验证了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经济形势、毕业态度、身体健康的显著影响,即再次验证了 H_0^4 与 H_0^6 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经济形势与身体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毕业态度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结合两次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经济形势、身体健康的加入导致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系数明显变小,结合两次回归结果,说明经济形势与身体健康在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即再次验证了 H_0^6 与 H_0^7 的结论。

本文回归及稳健性的另一个结论是疫情期间学习时间的增加会带来毕业态度的显著提升,而毕业态度的提升能显著的增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预期,该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在 OLS 与 IV-Tobit 两种方法上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表6 疫情认知程度对就业预期的影响(IV-Tobit)

变量	就业预期				经济形势	身体健康	毕业态度
疫情认知	0.384***	0.476***	0.511***	0.397***	0.137***	0.242***	0.007
	0.118	0.123	0.115	0.120	0.033	0.037	0.047
学习增加幅度	0.003**	0.004**	0.003	0.004**	0.001	−0.005***	0.004**
	0.001	0.002	0.002	0.001	0.001	0.002	0.002
经济形势	0.345***		0.378***	0.352***		0.319***	0.140***
	0.048		0.055	0.048		0.048	0.052
身体健康	0.205***	0.269***		0.204***	0.239***		0.049
	0.048	0.054		0.049	0.038		0.050
毕业态度	0.061*	0.092***	0.064*		0.093***	0.044	
	0.033	0.035	0.036		0.030	0.035	
未来规划	0.189**	0.190**	0.192**	0.196***	−0.002	−0.095	0.066
	0.075	0.083	0.081	0.076	0.077	0.087	0.102
所在地风险	−0.347***	−0.313**	−0.316**	−0.337***	−0.018	0.068	0.093
	0.126	0.130	0.140	0.130	0.127	0.142	0.144
搜寻次数	0.059***	0.075***	0.055***	0.058***	0.044***	−0.020	−0.019
	0.016	0.018	0.018	0.016	0.017	0.019	0.021
常数项	0.231	0.778**	0.404	0.330	0.013	0.005	−0.108**
	0.277	0.311	0.313	0.277	0.039	0.046	0.049
观测值	767				792		
模型总体评价							
Wald test of exogeneity (alpha = 0)	7.75***	9.21***	12.96***	8.12***	—	—	—
Wald test of Weak iv	13.71***	19.08***	27.52***	14.30***	—	—	—
Left censored	28				21	212	101
Right censored	104				245	80	161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粤、鄂两地问卷调研数据,研究了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本文研究的3个重要结论是:(1)新冠肺炎疫情认知、经济形势、身体健康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经济形势及身体健康是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影响的中介变量。(3)未来规划、搜寻次数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所在地风险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主要价值在于揭示了新冠肺炎疫情认知对就业预期的影响路径,研究结论对于稳定就业预期,促进其积极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本研究的实证结论,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1)全面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积极恢复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也影响到了劳动者的就业预期。本文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认知会对劳动者的就业预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认知会通过影响他们的经济形势预判、身体健康认知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就业预期,即疫情认知对就业影响具有双重性。稳定新冠肺炎疫情认知最为有效的办法是从源头上切断疫情的传播,及时公布疫情研究的新进展,及时公布疫情的防治措施,尽快全面控制疫情。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要做好积极复工复产工作,减少因疫情而造成的企业停产、减产、缩招及裁员的现象。

(2)注重就业辅导,加强心理疏导。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态度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有可能存在"倒 U"形的关系。对于部分毕业态度特别好的本科毕业生而言,其可能选择进行深造,但是我国研究生录取率相对较低,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就业形势又更加严峻,这部分毕业生要成为高校的重点关注群体。本文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未来积极的就业规划、个人身体健康与经济形势判断对就业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相关单位要注意培养劳动者的就业自信,引导其科学认识疫情,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做好积极地就业规划。

(3)规范劳动市场,消除地域歧视。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所在地风险会影响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用人单位对居住在武汉及湖北其他城市的劳动者招聘产生了抵触情绪,出现了部门企业公开或者隐蔽地拒招湖北籍劳动者的现象。因此,应当注意严格规范劳动力市场,防止包括地域歧视在内的其他一切歧视,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4)多渠道开展招聘,增加就业机会。本文研究表明,搜寻次数会显著地提高劳动者的就业预期。因此政府、高校及企业要努力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积极促进线上招聘,严格把控招聘企业的质量,警惕线上招聘"异化"风险,禁止因任务而随意拉企业"当排场",禁止因利益而拉企业"作掩护",尊重劳动者的择业意愿,积极促进其高质量就业。

参考文献:

[1]MCCALL J J.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and optimal stopping rul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3):300 - 317.

[2]曾湘泉. 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J]. 经济研究, 2004(6):87 - 95.

[3]赖德胜,田永坡. 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 经济研究, 2005(11):111 - 119.

[4]PRYOR F, SCHAFFER D. Age and the university educated: a paradox resolved[J]. Monthly Labor Review, 1997(7):3 - 14.

[5]GRAY J, CHAPMAN R. Conflicting signals: the labor market for college - educated work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1999(3):661 - 675.

[6]钱永坤. 搜寻理论与下岗职工再就业[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1(1):50 - 53.

[7]ALFANI G, PERCOCO M. Plagu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 lasting effects of the 1629 - 30 epidemic on the Italian cities[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19(4):1175 - 1201.

[8]邓越月,黄寰. 大学生就业中经验歧视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贝克尔歧视理论的运用和拓展[J]. 社会科学家, 2010(3):113 - 116.

[9]靳娟. 大学生就业中的经验歧视行为研究——以经济学为分析视角[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141 - 145.

[10]沈国兵.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和就业的冲击及纾困举措[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2):16 - 25.

[11]蔡昉,王美艳. "非典"疫情对我国就业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4):27 - 29.

[12]陆义敏. 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预期研究[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5):6 - 9.

[13]王震.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保护与社会保障[J]. 经济纵横,2020(3):7 - 15.

[14]STIGLER G J.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1(3): 213 - 225.

[15]DIAMOND P A. A model of price adjust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1(2) :156 - 168.

[16]DIAMOND P A. Wage Determination and efficiency in search equilibrium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2(2):217 - 227.

[17]MORTENSEN D T. Job Search, the duration of unemployment and the phillips curv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5):847 - 862.

[18]MORTENSEN D T, PISSARIDES C A. New development in models of search in the labor market[J].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1999(3):2567 - 2672.

[19]PO Y. Earnings expectation and graduate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recent Chinese college graduates[J].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2011(4):549 - 570.

[20]SHAPIRO C, STIGLITZ J E.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3):433 - 444.

[21]BLAUG M, LAYARD R, WOODHALL M. The causes of graduate unemployment in India[M].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69:237 - 239
[22]SMITH T E, ZENOU Y A. Discrete-time stochastic model of job matching[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3(1):54 - 79.
[23]ACEMOGLU D. Changes in Unemployment and wage inequality: an alternative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5):1259 - 1278.
[24]赖德胜.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4):69 - 76.
[25]CARNOY C.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critical appraisal[M]. 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1977.
[26]SCHOMBURG H. Higher education and graduate employment in Germany[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0(2):189 - 200.
[27]MORA J G, MONTALVO J G, ARACIL A. G. Higher education and graduate employment in Spain[J].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0(2):229 - 237.
[28]BETTS J R. What do students know about wag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undergraduate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1996(31): 27 - 56.
[29]Dominitz J, Manski C F. Eliciting student expectations of the return to schooling[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1996(1):1 - 26.
[30]蒋承,范皑皑,张恬. 大学生就业预期匹配程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高等教育研究,2014(3):34 - 39.
[31]蒯鹏州,杨宇涵,李业昆.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需求分布特征与成因 ——基于就业预期的中介效应[J]. 现代教育管理,,2014(11):96 - 100.
[32]雷湘竹,彭欣欣. 广西女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因素研究[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102 - 106.
[33]刘佳音,车蔷薇,吴晶. 大学生就业与薪酬预期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254 - 256.
[34]文东茅. 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 - 63.
[35]吕妍,王银凤. 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差序性影响[J]. 经济研究导刊,2010(24):276 - 280.
[36]朱晓妹,丁通达,连曦. 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因素研究回顾[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4):58 - 62.
[37]郑洁.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3):111 - 118.
[38]范皑皑,车莎莎. 大学生的就业预期与就业选择[J]. 教育发展研究,2014(23):27 - 33.
[39]尉建文. 父母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J]. 青年研究, 2009(2):11 - 17 + 94.
[40]龙立荣,黄小华. 大学生择业的社会生态模型:环境的力量[J]. 高等教育研究,2006(8):62 - 69.
[41]ROTHWELL A, JEWELL S, HARDIE M. Self-perceived employability: investigating the responses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9(2):152 - 161.
[42]SUN S, SONG Z, LIM V K G. Dynamics of the job search process: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3(5):771 - 784.
[43]谢义忠,何俊萍. 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求职认知评价、就业不安全感 对心理健康预测作用的追踪研究[J]. 心理科学,2015(6):1432 - 1437.
[44]黄悦勤. 新冠肺炎流行焦虑症状的自我缓解[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275 - 277.
[45]杨辉,范兆媛. 环境认知、环境行为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2016(19):97 - 99.
[46]BOCKORNY K, Y MORGAN C M. Entrepreneurs' Courag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Life Satisfaction[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10):789.
[47]FRESE M, GIELNIK M M. The psychology of entrepreneurship[J]. The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 Behavior, 2014(1):413 - 438.
[48]魏国江. 大学生创业资本及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基于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J]. 教育研究,2020(1):111 - 124.
[49]GROSSMAN M.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2

(2):223 – 255.
[50]张辉华,凌文辁. 理性、情绪与个体经济决策[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2 – 9.
[51]BUCK R, ANDERSON E, CHAUDHURI A,et al. Emotion and reason in persuasion: applying the ARI model and the CASC scal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4(6):647 – 656.
[52]GOLEMAN D. Emotional intelligence[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5.
[53]DAMASIO A R. Emotions and feelings: a neurobiological perspective[C]//In A. S. R. Manstead N. Frijda A. & Fischer (Eds.), Studies in emo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Feelings and emotions: The Amsterdam symposium (pp. 49 – 5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4]周孝,冯中越,孙珊. 个人健康投资能促进就业吗? ——基于 CHNS 的实证分析[J]. 人口学刊,2015(2):87 – 101.
[55]张车伟. 营养、健康与效率——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03(1):3 – 12.
[56]魏众. 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4(2):64 – 74.
[57]LUFT H. The impact of poor health on earning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5(57):42 – 57.
[58]邓晓红,张洁,卢洋等. 贫困大学生就业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1):86 – 91.
[59]赵俊英. 经济增长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非一致性分析——基于需求视角[J]. 湖北社会科学,2015(1):160 – 166.
[60]张建武,赵勋. 广东省有效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 1978 ~ 2008 年的数据[J]. 中国人口科学,2010(S1):95 – 101.
[61]周德禄. 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产业升级与大学生就业——2001 ~ 201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12(2):14 – 24.
[62]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2004(5):614 – 620.

The Effects of COVID – 19 Awareness on Employment Expectation

CHEN You-hua, ZHANG Zhu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A theore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capture the impacts of COVID – 19 awareness on employment expectation. The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Guangdong and Hubei Provinces, this study employ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overcome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OVID – 19 awareness on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pidemic awareness, physical health and economic situ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of workers, while the physical health and economic situ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mediation effect. This study further finds out that active employment planning and the number of job searche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of workers while local risk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o revive the economy as much as possible, strengthen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eliminate regional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broaden the recruitment channels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workers during the epidemic.

Key Words: COVID – 19; employment expectation; job search; mediation effect;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